

卓炯： 经济学的革命

李炳炎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卓炯：经济学的革命

李炳炎 著

广东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卓炯：经济学的革命/李炳炎著. —广州：广东经济出版社，2000.4

ISBN 7-80632-660-X

I. 卓… II. 李… III. 卓炯—经济思想—研究
IV. F09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7328 号

出版发行	广东经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5 楼)
经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广东科普印刷厂 (广州市广花四路棠新西街 69 号)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25
字数	305 000 字
版次	2000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0 年 4 月第 1 次
印数	1~2 000 册
书号	ISBN 7-80632-660-X / F·311
定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言

首先，我引用我国当代三位著名学者于光远、董辅弼、童大林对卓炯的评语，作为本书的开场白。

董辅弼说：孙冶方同志的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他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但应该说，卓老的理论在当今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更切合。所以，卓老也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

于光远说：广东的经济学家卓炯坚决主张中国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并很早写出许多论文，在我国经济学界起了首创作用。卓炯的这种主张阐述得特别鲜明，说话、写文章都很勇敢，因而产生的影响大，给人们的印象特别深，当时成了一面旗帜。

童大林说：在珠江三角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之所以发展得很快，首先是指导思想和理论观点先行，并且贯彻始终。卓炯同志和广东的一部分经济理论研究人员，从60年代起就不屈不挠地主张发展商品经济。

(一)

当代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质上是市场化改革。20年来，在改革路径与目标问题上，出现了激烈的争论，总的可以分为“计划取向”与“市场取向”两种观点。直到1993年党的十四大确定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改革目标，认

识才趋于一致。然而，长期以来却把“市场化”当作“私有化”的同义语加以批判和歧视，因为长期以来形成了“市场经济等于资本主义”这一错误观念。直到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才第一次为“市场化”平反、正名，并使之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代名词。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加快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这是对全党全国人民发出的坚决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步伐的伟大动员令。这个概括性的提法，旗帜鲜明地引导我们走向市场经济体制，全面彻底地用市场经济取代产品经济，令人耳目一新、精神振奋，开辟了新的理论境界。所以，“市场化”的正名，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然而，“市场化”这一概念长期被列为理论禁区，使用这个概念的经济学家往往遭受厄运与责难。我国已故著名经济学家卓炯先生则首当其冲。在当代中国，卓炯是市场化改革的最早倡导者。他提出市场化改革思路与理论对策最早、最全面、最彻底，也最始终如一、坚韧不拔。完全可以这样说：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市场化改革，市场化的思路是卓炯60年代初就提出来的，是卓炯奠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大思路。作为一位超前指示改革方向与路径的大经济学家，卓炯被誉为“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他是当之无愧的。

建国以后，在中国绝大多数学者热衷于学习、宣传斯大林的产品经济理论、主张逐步取消市场、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以建立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的时候，卓炯却早在1961年11月18日写道：“商品经济的集中表现形式是市场，而市场是人类经济生活一种进步的表现。从市场的大小和规模，可以看出一个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程度。在人类社会，没有一种东西比

市场对人的吸引力更大，它既经常而又持久。我们要消灭商品经济，就意味着要消灭市场。这对于人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否有这个必要，是值得我们加以重新考虑的。我觉得建设共产主义的任务并不是要消灭市场，而是要把无政府状态的市场（也就是自由市场）改变成为有计划的市场……消灭城乡差别，也在于使农村都市化，而不是都市农村化。”^①这在当时是大逆不道的奇谈怪论，却是震聋发聩的警世之言。现在重温此语，真感卓炯当时大有“众人皆醉我独醒”之意。他一开始就对斯大林的产品经济论持批判态度，而且是一批到底。在本书中，我多次详细阐述了卓炯对产品经济论的挑战与全面批判。卓炯1961年提出的要“重新加以考虑”的任务，我们足足花费了32年时间，到1993年才考虑清楚，确认了市场经济。在这32年中，中国的改革思想和经济理论的发展，经历了多少曲折、反复和磨难！多少人误入歧途，多少人随波逐流、随风摇摆、中途易帜。只有卓炯等寥寥数人，才能做到始终如一、初衷不改，高瞻远瞩、指点迷津，为中国的改革发展导航引路不出偏差，终成定势。这是何其难能可贵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理论坚定性、彻底性！这是何其高尚的品格和坚强的意志！人们都称道，卓炯的理论品格，已到炉火纯青、超凡脱俗的境界。在本书中我力图从多个侧面刻画出卓炯的这种高贵品格。

(二)

在当代世界各国，各种学派林立，各种新学说层出不穷。

^① 卓炯著：《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广东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页。

仅就经济学的学派来说，就有凯恩斯学派、制度经济学派、瑞典学派、货币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供给学派、伦教学派、弗莱堡学派、公共选择学派、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等十大学派。虽然半个多世纪来这些经济学派论争异常激烈，相互替换统治地位，但其共同本质却是不变的，即都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为维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服务的。当然，其中包含的关于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的属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共同规律性的东西，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不能否认，这些学派的繁荣，对于二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发展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但是，我们中国却至今无学派，尤其没有经济学派，这是不正常的。中国无学派，原因何在？是中国学者无创见吗？不是的。对学派和学说采取不承认主义，究其原因有五。一是在建国以来几十年间，长期受“左”的思想影响，多少年来习惯于用一个脑袋思考，用一个声音说话，听不得不同的声音。二是习惯于搞庸俗的平均主义，不允许学术竞争。三是由于知识分子没有社会地位，把学术研究成果当作花瓶一样作摆饰，政府经济决策与学术研究是两张皮，相互脱离。这样，任何学说都进不了大雅之堂，占据不了统治地位。四是常以“不成熟”、“门户之见”作推诿，不承认、不扶植学派。五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过于谦虚，不敢自荐。中国无学派，就会使学术界鸦雀无声、死气沉沉，谈何繁荣学术？当代中国面临的经济社会问题一大堆，没有学说创新、学派形成，谁来解决？在不同学派的竞争中，方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一切等待上面说了算，往往会造成重大的决策失误。等到出现教训则为时已晚。这种教训难道还少见吗？可见，中国无学派，是有百害而无一利。

其实，我们党早已颁布并一直重申了“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方针，是主张扶植新学说、新学派的。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就必须鼓励发展新学说、新学派。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①当然也应包括我国自己的文明成果。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任务，重申积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号召全党：“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我们一定会创造出更加绚丽多彩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对人类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②并指出，经济理论创新，要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这就要求我们进行理论创新，产生新学说，建立新学派。

学说，是知识的精华。有学说的知识分子，是知识分子的精华。邓小平同志一贯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真正尊重知识，就应首先尊重学说；要真正尊重人才，就应首先尊重各个学派中的人才。学派，是某种学说的学术阵地和人才群体。否认学派的存在与发展，就是否认学说的存在与发展。中国如果长期无学派，就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也会使“双百方针”和“两个尊重”不能落到实处。

大凡学派的出现，总是历史上某一时期遇到了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某个重大问题，有个别人发觉了研究解决这个问题新的思路并形成较系统的理论或对策意见，便就形成了一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第373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版，第39页。

种新的学派。然而人的认识总是相对的，学说的正确与否，也是相对而言的。即使是错误的学说，只要能一以贯之，自圆其说并形成体系，就可以称为学说，形成自己的学派。例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是错误的，但照样可以称之为学说。我们知道，当代颇有影响的凯恩斯学派，就是由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所创立的。他所面临的问题，是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大危机，威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生存。面对此，传统的古典经济学已失灵。针对这一重大课题，他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提出了新的经济理论，形成了凯恩斯经济学说即西方宏观经济学，建立了自己的学派。他在经济学上实现了一场革命，被称作“凯恩斯革命”。它是30年代大萧条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产物。从一般社会生产过程来看，它是市场经济由自由市场经济发展为现代市场经济（有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的理论表现，因而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三）

卓炯所面临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遇到的重大课题，是社会主义建设按照传统的前苏联的模式进行已出现了失败，社会主义经济几经挫折，濒临危机，愈搞愈穷。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前苏联斯大林的产品经济理论已经失灵。针对这一世界性的难题，卓炯率先另辟蹊径，建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和“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最早倡导了市场化改革。他的理论能一以贯之，自圆其说，自成体系，并形成了自己的新的政治经济学体系，提出了“社本”、“公共必要价值”、“扩大商品经济”等一系列新范畴。从而与产品经济论彻

底决裂，在当代社会主义经济学上实现了一场革命，有人称之为“卓炯革命”。经过近 40 年的实践的检验，证明卓炯的经济学说是科学的、正确的，已经在指导中国经济改革实践中产生了积极作用。因此，卓炯的经济学说与经济学派，是完全能够成立了的。在本书中，我将从多个侧面、多个问题上加以阐明。

卓炯生前早就想建立自己的学派。他曾多次自称为“社会分工派”，意即市场经济论的社会分工学派。但他自己未曾以自己的名字对学派加以命名。卓炯逝世后，我将这一学派命名为“卓炯学派”，人们将它简称为“卓派”，并将我称为“卓派大弟子”，“卓炯的继承者”。1984 年中央承认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以后，直到 1987 年 6 月卓炯逝世之前，卓炯的工作重点之一是企图建立自己的学派。他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有：（1）通过培养研究生物色学术继承人。我便是他看中并长期指导的一个。他常说：“李炳炎受我的影响最深。”并要我当他的学术助手。我的研究生同学黄方正，也是卓炯看中的一个。（2）在校外、社会上物色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卓炯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该校黄家驹教授指导的研究生李江帆的硕士学位论文，得到了卓炯的着力指导。当时论文提出“服务消费品”的概念，是存在争议的，得到了卓炯的有力支持。论文后来扩展成专著《第三产业经济学》，获孙冶方经济学奖。该书原是列入卓炯主编的《商品经济研究丛书》计划的。（见本书第一篇所引用李江帆的回忆）。被卓炯笑称“马路上拣来的学生”的杨永华，原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本科生。原《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经济编辑室副主任韩志国，师从卓炯学说，在其论文中发挥了卓炯的不少观点。卓炯曾对我说：“韩志国是有才的。”（3）抓紧完成其理论体系。他的《〈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

一书的参与写作者，均是由他亲自点名、安排的。他们是：李炳炎、杨永华、胡怀邦。(4)卓炯办了一个“社会自修大学”。全国各地的中青年学者，纷纷寄文章、书稿请他指导。他是来者不拒，有信必回，每篇文章必作批语。他的案头常常堆满全国各地寄来的文稿、书稿待批阅。卓炯逝世后，我协助清理其书房，发现办公桌抽屉中满满的信件中90%是青年人的来信。可见他对青年寄有多么深的期望。收入本书人名中的一位叫伍建林的，就是其中之一。(5)团结了一批长期关心、支持卓炯的学术活动的学者，有：于光远、何伟、赵振英、张友仁、黄家驹、肖步才、杨承训、丁家树、郭大同、应以明、张立、杜闻贞、熊映梧、洪远朋等人。卓炯与他们保持经常联系，听取他们的意见。(6)卓炯计划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套《商品经济研究丛书》，并由他亲自拟定了第一批10本书的书名与作者。同时准备开办商品经济研究讲习班。但是，这两项计划由于卓炯突然逝世而未实施。(7)卓炯希望他的学说面向国际社会。他曾责成我与日本经济学界联系，准备赴日讲学。

卓炯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学派，逐步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卓炯逝世后，广东经济学界于1988年举办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双月研讨会”，其成果于1988年6月由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一书，就是按照卓炯的思路扩展而成的。这一活动得到了马洪、吴敬琏等的支持和参与。这本书，既成了1989年下半年起一段时间内计划经济论者围剿市场经济学派的靶子，又在我国确定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改革目标过程中起了积极推动作用。

从本书的论述中，读者可以看到，卓炯的基本观点，怎样一步一步地被党和政府的决策所采纳，被社会上的大多数学者

们所认同。特别是改革 20 年来，几乎对经济改革指导理论的每一次推进，都与卓炯的理论有联系。例如，本书中的《卓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便是将党的十三大报告的观点与卓炯理论作了对照而写成的。《论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的生命力》等篇，是将党的十五大报告观点与卓炯理论作了对照而写成的，等等。

(四)

卓炯学派的创建，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我在 1987 年 1 月 3 日致卓炯的信中曾这样说：“毕业离穗时，你我相约为创立学派而努力。建立卓炯学派，是我多年的心愿。目前有了一点进展，出版社问题解决了。”当时感到充满希望，事业似乎将成功。

卓炯不仅是我的导师、学术引路人，更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学习的楷模，也是我亲密无间的战友、知己。他不仅教我怎样治学，而且教我怎样做人、处世。我对卓炯怀有深厚的感情。卓老也对我特别关怀和器重。卓老曾几次这样讲：“现在真正理解我、真正懂得我的学问的，只有两个人，李炳炎便是。”在给我的信中，他也这样讲过，并称我为他的“知己”。他曾在 1985 年在他家中对我说：“我有你这样两个学生就够了。”1986 年 11 月在宁讲学期间，卓老曾两次当着客人的面夸奖我。当客人们说：“卓老，炳炎是您的高足、得意门生，很能干”时，卓老满意地笑着，指着我向客人介绍说：“他是最中意的学生，最能理解我、体贴我。”在宁 10 天，他作了 9 场报告，太累了。最后 2 场报告是请我代他讲的。他坐在我

旁边，讲一个开头，一个结尾，中间轻声作些提示。他让我代他写书稿、写别人书的序，代他与有关学者、出版社联络。在宁时，他还说：“现在我的学生中，炳炎的情况最好”（指成果多，有影响，受重视）。当我办成一些事后，他总是笑着说：“你还是个社会活动家。”他来南京讲学时，我老父亲特地去招待所看望他，说：“感谢卓老对我儿子的培养。”卓老对我父亲说：“炳炎对我太好了。他从当研究生时起，就一直对我很好，一直是我的好助手。”他返回广州后致信我，说：此行讲学成功，有你的功劳。还致信我妻子，说：“感谢丽娟同志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当时校领导全部出席，在我家为卓老接风）。卓老不仅关心、爱护我，更是严格要求我，对我寄以重望。

卓炯要我当他的学术助手，是因为他胸怀大志，要在他的在世之年完成一项大业。这就是创建社会分工学派，实现一场当代中国经济理论上的革命。而他，就是这场理论革命的领衔人物或旗手。在他生命后期，随着年龄的增大，他的这一愿望愈加强烈。在1986年1月至1987年6月这段时间，他急于完成的任务是：第一，完成他的经济理论体系；第二，成立《商品经济研究丛书》编委会，并出版第一批书目（10本）；第三，组织学派梯队，特别是着力发现赞同社会分工论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资本论〉体系与社会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理论读本》、《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卓炯自选集》、《政治经济学新探》这几部书的写作、编撰、选编和修改再版工作，就是在这一年半时间内完成的。所以卓老以及我们的工作都十分紧张。1987年上半年，为了用通信方式修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理论读本》一书的书稿，以便抓紧时间出版，年近八旬的卓炯在1987年1月6日至1月22日16天时间内，

连续给我写了5封书信，平均3天一封。主要是讲这本书稿的修改问题，在这16天中，他共详细修改了近30万字的书稿。我这里从南京寄出一章，他改一章，再寄回给我修改；无须再改的由他直接寄给云南人民出版社。他就是如此勤奋地工作的。我就是用这种通信的方式协助他工作的。

卓老是1987年6月22日住院、24日逝世的。他在6月19日给我写了最后一封信。在这封6月19日的来信中，他讲到：现在商品经济理论宣传落后于形势，这正是他大声疾呼的。要我在《商品经济研究丛书》计划目录中补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理论读本》、《论扩大商品经济》、《国际分工论》等3本书的书目。同意杜闻贞所著书的由卓老写的序发表。对《社会必要产品论》一书获孙冶方奖表示看法。可见，卓老是在紧张勤奋的工作中倒下的。他获特等劳模称号，实在是当之无愧。

我在1987年6月20日写给他最后一封信，估计未收到，因为6月22日他住进了医院。我在这封信中，主要是回答卓炯6月14日致我的信中的问题。

由于卓炯的突然逝世，正在崛起的卓炯学派暂时遇到了挫折。但是，卓炯学说的生命力还在不断发挥出来。其证明之一是：卓炯学派的奠基之作之一《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书，在其身后历时11年的1998年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之一。

卓老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12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卓炯经济理论日益显示生命力并被广泛认同。

现在，不管人们承认不承认，卓炯学派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派。卓炯学派的发展，却是任务艰巨，任重而道远。

我愿通过本书的出版，小结一下我对卓炯经济学说的研究心得。我认为，卓炯经济学说十分深刻而且内容丰富，具有无量的发展前途。有一些问题，我尚未来得及去研究，今后将继续作深入研究。研究卓炯的经济学说，加以发挥、发展和应用，是我的长期研究课题之一。

多年来，我研究卓炯经济学说所发表的论文，有代表性的有如下一些：

《当代中国经济学家——卓炯》，载于《湖北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卓炯谈商品经济是“社会分工制度”》，载于《理论信息报》1986年12月29日；

《〈三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后记》，载于《经济问题》1987年第10期；

《卓越的理论贡献 深邃的远见卓识》，载于《盐城党校学报》1989年第2期；

《卓炯：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载于《江海学刊》1990年第3期；

《论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载于《学术研究》1993年第3期；

《卓炯经济学思想述评》，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

《彻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载于《彝州论坛》1999年第2期。

我将继承导师卓炯的遗志，肩负时代赋予的重任，一如既往，不遗余力地为发展卓炯学说和卓炯学派而努力工作。

（写于1999年11月12日）

目 录

导 言	(1)
-----	-----

第一编 卓炯评传

第一章 卓炯的生平与品格	(2)
一、曲折的奋斗历程	(2)
二、主要著述	(6)
三、革命生涯	(7)
四、不解之缘	(9)
五、诲人不倦	(10)
六、巨星陨落，举世哀恸	(13)
第二章 作为经济学家的特等劳动模范	(19)
一、“广东的孙冶方”	(19)
二、七个方面的理论贡献	(24)
三、特等劳动模范和优秀共产党员	(27)

第二编 卓炯学说概述

第三章 市场经济社会分工说	(34)
一 对卓炯理论体系的新概括	(34)

二、创新的经济学说	(37)
三、超前的理论探险	(41)
第四章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先驱	(47)
一、最早奠定了经济改革的理论基础	(47)
二、关于“本质区别”的科学分析	(49)
三、计划必须以价值规律为基础	(53)
四、中国市场化改革的最早倡导者	(57)
五、卓炯的重大理论贡献	(59)
第五章 卓炯经济学说的方法与特点	(70)
一、研究方法论	(70)
二、卓炯经济学说的特色与体系	(75)
三、商品经济论与市场经济论	(80)
四、经济学体系的创新	(88)

第三编 卓炯学说专论

第六章 彻底的商品经济理论体系的创立	(93)
一、注重运用唯物辩证法	(94)
二、计划商品经济论	(97)
三、价值规律体系论	(103)
四、对两个“规律”的否定	(106)
五、“公共必要价值”	(111)
六、一部开拓性论著	(116)
第七章 卓炯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123)
一、1957 ~ 1964 年奠定基本框架	(124)
二、1978 ~ 1984 年建立完整体系	(134)
三、1985 ~ 1987 年继续推进和深化	(147)